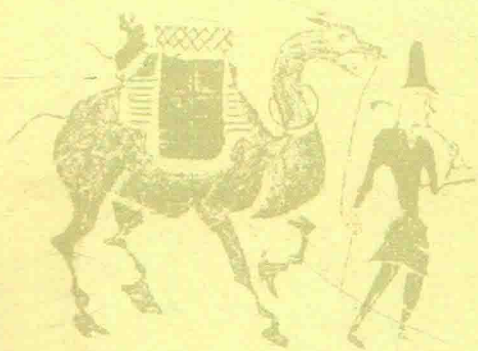


大唐西域记译注

上

〔唐〕玄奘撰著
〔唐〕辩机编次
芮传明译注

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



中华书局

大唐西域记译注

上

〔唐〕玄奘撰著
〔唐〕辩机编次
芮传明译注

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唐西域记译注/(唐)玄奘撰著;(唐)辩机编次;芮传明译注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9.7

(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)

ISBN 978-7-101-13911-2

I.大… II.①玄…②辩…③芮… III.①西域-历史地理-唐代②《大唐西域记》-译文③《大唐西域记》-注释

IV.①K928.6②K935.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9)第 106369 号

-
- | | |
|-------|---|
| 书 名 | 大唐西域记译注(全二册) |
| 撰 著 者 | [唐]玄 奘 |
| 编 次 者 | [唐]辩 机 |
| 译 注 者 | 芮传明 |
| 丛 书 名 | 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 |
| 责任编辑 | 朱立峰 |
| 出版发行 | 中华书局 |
| | 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 |
| | http://www.zhbc.com.cn |
| | E-mail:zhbc@zhbc.com.cn |
| 印 刷 |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|
| 版 次 | 2019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|
| | 201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|
| 规 格 | 开本/880×1230 毫米 1/32 |
| | 印张 28½ 插页 4 字数 650 千字 |
| 印 数 | 1-6000 册 |
| 国际书号 | ISBN 978-7-101-13911-2 |
| 定 价 | 89.00 元 |
-

前言

一、《大唐西域记》的作者问题

《大唐西域记》是唐初高僧玄奘西行求法，历十七年，经百余国，凡五万余里的游记。该书内容丰富，涉及中亚、西亚、南亚地区内许多国家的山川地形、城邑关防、交通道路、风土习俗、物产气候、语言文字、政治经济、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，并有不少佛教故事传说。此书早在古代就已成为名著，降及近现代，更是蜚声士林，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。然而，《西域记》如此赫赫有名，其作者却至今未能完全肯定——至少未被学术界一致公认，从而难免令人遗憾。在此则首先谈论它的作者问题。

当今所见的《大唐西域记》的印本，自北宋本以下，每卷卷首的作者题名，都分列成这样两行：

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

大总持寺沙门辩机撰

这一题名款式十分特殊，也很难理解。似乎此书乃是由玄奘译自梵文；但是为何同时又称辩机撰写？现代有的研究专著则将玄奘和辩机都视为作者（例如，季羨林等《大唐西域记校注》封面署为“玄奘 辩机原著”），似乎也不确切。我赞成将玄奘看成作者，而辩机只是加以润色和编排的观点。兹申述理由如下。

清朝乾隆年间,王鸣盛在其《十七史商榷》卷九十二“西域记”条下指出:“《旧·方伎传》:‘僧玄奘……撰《西域记》十二卷。’……考石刻太宗御制《圣教序》,及高宗为太子时制《述圣记》,宏福寺沙门怀仁集王羲之书,并钱希白《南部新书》辛卷所载,与《旧书》略同。《玉海》第十六卷云:‘唐《西域记》十二卷,玄奘译,辩机撰。’今佛藏有此,卷首并列二僧名。据《旧书》云云,则玄奘所译乃佛经。此书玄奘自撰,何译之有?辩机恶僧,岂能著书?《玉海》非是,藏本承其误耳。”王氏谓辩机恶僧,不能著书(辩机守身不正,曾与高阳公主私通,事泄后,被太宗腰斩),此言固然不合逻辑;但是他清楚指出辩机并非《大唐西域记》的作者,则颇有根据和见地。事实上,唐代的许多著述中都声称此书乃玄奘所撰。例如,贞观二十年(646年)七月十三日,玄奘在其所上的《进西域记表》中说道:“至于玄奘所记,微为详尽,其迂辞玮说,多从翦弃,缀为《大唐西域记》一十二卷,缮写如别。”道世在其撰成于高宗总章元年(668年)的《法苑珠林》卷一百《杂集部》记云:“《大唐西域传》十三卷,右此一部,皇朝西京大慈恩寺沙门玄奘奉敕撰。”又,慧琳在其成于宪宗元和(806—820年)初的《一切经音义》卷八十二清楚标明,《大唐西域记》乃是“三藏沙门玄奘奉敕撰”。其它如《开元释教录》、《贞元释教录》等唐代佛教典籍也都只称《大唐西域记》为玄奘所撰,而不称玄奘译,并绝不提及辩机的名字。由此可知,所谓“辩机撰”的题款,只是宋代及其以后的事情。

为什么宋代会将辩机误解成《大唐西域记》的作者?贺昌群在其《大唐西域记之译与撰》一文中是这样解释的:唐代道宣所

著《大唐内典录》卷五列出玄奘所译大、小乘经论六十七部，最末为《大唐西域记》十二卷，总称“京师大慈恩寺沙门玄奘奉诏译”（未提辩机之名）；显然，这种题款极易使人误认为《大唐西域记》也属玄奘翻译的佛经之列，遂启后世称《西域记》为玄奘所译之端。此后，宋太祖在开宝四年（971年）开雕蜀板藏经，既误据《内典录》之题款，又因辩机《记赞》中有“爰命庸才，撰斯方志”一语，遂题成“辩机撰”。后世因袭之，致有此误。这一解释言之成理，很可能符合——或者至少接近——事实。

至于辩机在《大唐西域记》的成书过程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？我认为，周连宽的观点是可以接受的（见氏著《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》“附录一”）：比较接近事实的说法是，辩机整理玄奘所得材料而成书。《记赞》中“恭承志记，伦次其文”一语表明，玄奘交给辩机的原稿，很可能已是《志记》，辩机不过加以编次排比而已。道宣《续高僧传》卷四《玄奘传》云：“（玄奘）微有余隙，又出《西域传》一十二卷，沙门辩机，亲受时事，连牋前后。”这实际上正是道宣为自己《大唐内典录》中《西域记》条所作的注解。当时道宣是玄奘译经的助手之一，其言可信。所以，“沙门辩机，亲受时事”当理解为：辩机接受玄奘游历各国所记当时的事情；“连牋前后”，则应理解为：辩机把玄奘原稿的内容连贯排比成为一部更有系统的著述。有鉴于此，应该把现行《大唐西域记》的著录款式改正为“唐释玄奘撰 辩机编次”。

二、玄奘的生平

在叙述玄奘的生平事迹之前，有两个关键的时间问题必须首先予以澄清，即，玄奘的诞生年份或其年寿问题，以及玄奘出发西行的年份问题。显然，这两个时间关系到玄奘一生中其它重大活动的时间，不能轻易忽略。

（一）玄奘的生卒年份

玄奘是一位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人物，但是，对于他的年寿，唐人的传记、行状、塔铭、经录等的说法各不相同；即使在同一篇文章内，其前后年岁的记载也自相矛盾。所以，这一问题迄于现代仍然众说纷纭，未有定论。在唐人的记载中，对于玄奘卒于高宗麟德元年（664年）二月初五夜半的说法并无异辞；但是，由此逆推其出生年份与年寿，则有不少异说。主要有如下几种：

甲、六十三岁说 冥祥《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》（约成于玄奘逝世的同年四月间）记云：“麟德元年……（玄奘）谓弟子及翻经僧等：‘有为之法，必归磨灭，泡幻之质，何得久停。今麟德元年，吾行年六十有三，必卒于玉华。若于经论有疑，宜即速问，勿为后悔。’”由此逆推，则玄奘应生于隋文帝仁寿二年（602年）。对于此说，不少中外学者持赞同意见。例如，陈垣《释氏疑年录》及《书内学院新校慈恩传后》、刘汝霖《唐玄奘法师年谱》、朱东润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述论》、田光烈《玄奘哲学思想中之辩证法因素》、堀谦德《解说西域记》、前岛信次《玄奘三藏》等都持这一观点。

乙、六十五岁说 道宣《续高僧传》(成于玄奘逝世的翌年)卷四《玄奘传》记云:“麟德元年,(玄奘)告翻经僧及门人曰:‘有为之法,必归磨灭,泡幻形质,何得久停。行年六十有五矣,必卒玉华。于经论有疑者,可速问。’”由此逆推,则玄奘应生于隋文帝开皇二十年(600年)。陈思《唐玄奘法师年谱》、蒋维乔《中国佛教史》、吕澂《玄奘法师传略》、道端良秀《唐代佛教史研究》、望月信亨《望月佛教大事年表》等均从此说。

丙、六十九岁说 慧立原著、彦棕笺补的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(成于玄奘逝世后的第二十四年,即武后垂拱四年)卷十载云:“至(显庆)五年春正月一日,起首翻《大般若经》。……(玄奘)谓诸僧曰:‘玄奘今年六十有五,必当卒命于此伽蓝。经部甚大,每惧不终,人人努力加勤,勿辞劳苦。’”据此,显庆五年(660年)时玄奘已经六十五岁,则其诞生年份当为隋文帝开皇十六年(596年),亦即是说,玄奘应当享年六十九岁。梁启超《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》、苏渊雷《玄奘》、向达《玄奘法师》等均持此说。

以上三种说法所据的原始资料中,《慈恩传》成书时间最晚,并且先由慧立写成五卷,后由彦棕竭力搜寻早先流散的五卷,再加补充整理,才成现有的十卷;所以,其权威性不及前二者。换言之,六十九岁说恐怕有误。至于前二种说法相比较,《续高僧传》的作者道宣是一位著名的佛教史学家,其记载应当更为严谨;次外,有更多的原始资料证实《续高僧传》之说。所以,可能六十五岁说更为接近事实。杨廷福亦持六十五岁说(见氏著《玄奘论集》“玄奘年寿考论”篇),并具体地论证了这一观点。其主

要论据可以概括如下：

甲、六十五岁之说始于道宣的《续高僧传》。而道宣则是玄奘的同辈人（生于596年）；并从玄奘开始在弘福寺译经之时，就在译场掌缀文，后又在西明寺充任上座，与玄奘一起译经，直到玄奘去世，道宣几乎始终在京师。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。故按常情论，以道宣这样的身份，不至于搞错玄奘的年寿。

乙、道宣的写作态度严肃认真，以《续高僧传》为例，他力求查明所传者的生卒年月，凡不可考见，均付之阙疑；而书中又以《玄奘传》用力最勤，篇幅最长，故玄奘之年岁不应有误。此外，玄奘逝世，高宗为之罢朝，“京城道俗，奔赴哭泣日数百千”（语见《慈恩传》卷十）；而当时道宣正在长安，不久后即成《续高僧传》。按此背景推测，难道道宣还会不知道玄奘的正确年岁？

丙、《慈恩传》和《塔铭》均谓玄奘十三岁在东都蒙大理卿郑善果的器识，始得引渡出家。按玄奘享年六十五岁计算，是年为大业八年（612年）；而据《隋书·炀帝纪》、《樊子盖传》、《裴矩传》、《旧唐书·郑善果传》等，郑善果于大业八年恰好在大理卿任上。这为六十五岁说又添一证。

丁、《慈恩传》卷九所载显庆二年九月二十日玄奘之《请入少林寺表》中有“岁月如流，六十之年，飒焉已至”句。按词义训释，“飒焉已至”乃是“倏然将临”之意；则若以玄奘享年六十五岁计，显庆二年为五十八岁，与“六十之年，飒焉已至”之辞完全吻合。反之，与其它年寿说均相矛盾。

戊、旧抄本《重请入山表》当是玄奘手笔，其中说道：“沙门玄奘言：……自奉诏翻译，一十五年，夙夜匪遑，思力疲尽。

行年六十，又婴风疹，心绪迷谬，非复平常，朽疾相仍，前途诘几。”玄奘从贞观十九年（645年）开始译经，上表时为显庆四年（659年），其间恰为十五年；是年玄奘既然自称六十岁，则他去世时（麟德元年，即664年）为六十五岁可无疑问。

（二）玄奘西游的首途年份

关于玄奘西行首途的年份，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，大致可以分为贞观元年说、二年说、三年说。梁启超提出四证，首创元年说（见其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第五章、《佛学研究十八篇》附录三、《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》等）；其后冯承钧、刘汝霖、曾了若、黄忏华、向达、任继愈、田光烈、杨廷福，以及日本学者前岛信次均从之。丁谦则主二年说：“唐太宗贞观二年，东都僧玄奘遍游五印度，至贞观十九年返，前后凡十七年。”（见氏著《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》，《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二集》）吕澂及日本学者宇井伯寿等都曾经赞成此说。陈垣竭力主张三年说（见氏著《书内学院新校本慈恩传后》）；嗣后，研究中国哲学史、佛教史与中西交通史的学者如陈思、张星烺、蒋维乔、周叔迦、朱东润、苏渊雷等均从同之。

一篇很有说服力的文章是杨廷福的《玄奘西行首途年月考释》。他通过五个方面的探讨，得出玄奘在贞观元年八月西行首途的结论。这五个论据是：

甲、玄奘译毕《菩萨藏经》后与《西域记》同时奏上的《请御制三藏圣教序表》（载《广弘明集》卷二十二）说道：“奘以贞观元年往游西域，求如来之秘藏，寻释迦之遗旨，总获六百五十七部。”故其它典籍之所以作“三年”，很可能是因为“元”、“三”

两字形近而产生传抄之误。

乙、西突厥可汗统叶护确实死于贞观二年；所以，玄奘只有在贞观元年启程，才有可能在二年初夏抵达素叶城，与统叶护可汗晤面。

丙、有人认为玄奘会见的突厥可汗乃是统叶护之子肆叶护，而非统叶护本人。实际上，种种史料都表明，玄奘所会见的确是统叶护，而非肆叶护。因此，玄奘不可能在贞观三年首途。

丁、玄奘抵达高昌后，高昌王麴文泰礼敬备至，与玄奘结为兄弟，再三挽留；玄奘在那里也确实逗留了好长一段时间。然而，按《通鉴》所记，贞观四年十二月，高昌王麴文泰曾经入朝唐廷。因此，按时间推算，玄奘只有于贞观元年首途西行，才来得及在高昌与麴文泰相聚许多时日；若于贞观三年动身，则高昌王不可能在离国赴中原之前与玄奘久聚，甚至二人在中途交错而过也未可知。

戊、各种史料均谓玄奘往返西域达十七年。仔细统计玄奘的行程以及在各地淹留的时间，确实需要十七足年。玄奘在返程中曾被于阗王挽留，未能立即回到中原，故曾修表遣人先送朝廷，其表文有“历览周游，一十七载”之语；而当时正值贞观十八年。所以，玄奘唯有在贞观元年首途，才可能使用这一措辞；若在贞观三年启程西行，无论如何谈不上“历览周游，一十七载”。

（三）玄奘的生平事略

玄奘于隋文帝开皇二十年（600年）诞生于陈姓之家。相传其远祖是后汉时颍川郡许县（今河南许昌县东）人陈仲弓。玄奘以上四代为官。高祖名湛，任北魏清河太守；曾祖名山，任

北魏征东将军、南阳郡开国公；祖父名康，北齐国子博士，转司业，又转礼部侍郎，始移居洛阳附近，后成为缙氏县（今河南偃师县南）人；父名惠，曾任陈留县令、江陵县令。玄奘之二哥名素，出家后法名长捷，也是一位著名的僧人。

玄奘自小勤奋好学，得其二兄长捷的直接指导，对于佛学更是爱好。隋炀帝大业八年（612年），他得大理卿郑善果的特别赏识，在洛阳出家，时年方十三。玄奘十九岁时（618年），离开洛阳，前赴长安；旋即经汉中一带南入成都，在此逗留较久（约619—622年），听道基、宝暹等讲法，数年之间，熟习佛教各部学说。玄奘并在成都受具足戒，成为完全的僧人，时当唐高祖武德五年（622年）。此后，他又赴荆州、相州、赵州等地求学，然后约于武德九年（626年）年底返回长安，住大觉寺，并就道岳、法常、玄会等学《俱舍论》等佛经。所以，玄奘在西行之前，已在国内就学于十三位佛家名师，几乎尽通中国的佛学。

玄奘越来越不满足于中国佛学的紊乱状况，有许多问题均未得到彻底解决；同时又受来自印度那烂陀寺的高僧明友的影响，遂决心前往印度直接探索佛学的精髓，并取《瑜伽师地论》。当他终于踏上西行的征途时，已是贞观元年（627年）八月。玄奘取道如今的甘肃、新疆，历经西域诸国，行程数万里，遭遇了种种艰难险阻，才到达北印度。在北印度又经十余国，始抵当时印度佛教的最高学府那烂陀寺。时当贞观五年（631年）十月初，玄奘三十二岁。此时那烂陀寺的主持是著名高僧戒贤大师；据说戒贤已经一百多岁，是为了等候玄奘才继续留在人世的。戒贤对玄奘异常器重，特遣四位长老、两百余僧、千余施主迎接玄

奘进入那烂陀寺。玄奘在那烂陀寺求学、研究，前后共达五年。在那里听戒贤大师讲授《瑜伽师地论》共三遍，又听《顺正理》一遍，《因明》、《声明》、《集量》等各二遍，《中论》、《百论》各三遍；同时又学婆罗门教经典及梵书，对印度的语言也下了一番功夫，为归国后的翻译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

玄奘旅印期间，还去其它各地游学，拜访过不少名师，参观了许多古迹，获得了广博的知识。贞观十五年（641年），玄奘辞别北印度的雄主戒日王，启程回国，时年四十二岁。

贞观十九年（645年）正月，玄奘“倍途而进”，于二十四日行抵长安西郊漕上，由于民众奔凑观礼，前进不得，只能留宿于此。房玄龄遣右武威大将军侯莫陈实等前往迎接；玄奘遂于二十五日进入长安城。玄奘从印度带归中国的，除了一些如来舍利和佛像外，尚有佛教的经、律、论共五百二十夹，计六百五十七部，用二十匹马驮载。

同年二月，玄奘应召前往洛阳行宫晋见太宗；嗣后即奉诏回长安弘福寺组织规模宏大的佛经译场，开始翻译事业。玄奘从贞观十九年五月，一直到麟德元年正月，即他逝世前一个月，差不多整整十九年的时间内，都在率领学问僧们勤勤恳恳地从事译经工作。《慈恩传》卷七描述玄奘的日常生活道：“自此以后，专务翻译，无弃分阴。每日自立程课，若昼日有事不充，必兼夜以续之。遇乙之后方乃停笔。摄经已，复礼佛行道，至三更暂眠，五更复起，读诵梵本，朱点次第，拟明旦所翻。每日斋讫，黄昏二时讲新经论，及诸听学僧等恒来决疑请义。……日夕已去，寺内弟子百余人咸请教诫，盈廊溢庑，皆酬答处分无遗漏

者。”在这十九年间，玄奘除了有时奉诏入宫伴随皇室外，大部分时间都在长安的弘福寺、大慈恩寺、西明寺以及长安以北的玉华宫寺进行翻译。由他主持翻译的佛教经籍，共计七十五部，一千三百三十五卷，不但数量巨大，质量也臻上乘。

唐高宗麟德元年二月五日夜半，玄奘法师在玉华宫寺辞世，终年六十五岁。消息传到长安，文武百官以及僧俗人等莫不悲悼，高宗为之罢朝数日。四月十四日，遵照玄奘遗嘱，葬于浐水之滨白鹿原，五百里内执拂者不计其数。总章二年（669年），有敕迁葬玄奘于樊川北原，营建塔宇。神龙元年（705年），敕在东、西两京各建一佛光寺，追谥玄奘为大遍觉法师。

三、《大唐西域记》的主要成就和特色

《大唐西域记》是我国古代极为重要的一部地理著述。它不但使中国地理学达到空前的水平，对于印度以及亚洲其它地区的地理学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在玄奘之前，虽然早有不少地理著作，但它们不是夹杂着浓重的神话传说成份（例如《禹贡》、《山海经》、《穆天子传》等），就是叙述范围较小（例如《法显传》、《惠生行传》等）。玄奘西行的时代，在中国方面，正值唐代一统天下，声威逐渐远播之时，所以在今新疆等地的旅行颇为顺利；此时西突厥政权在中亚等地的“强制和平”又有助于他在该地区的活动；至于北印度，也恰值笃信佛教的戒日王雄霸之时，这大大有利于玄奘在那里的求学和旅行。玄奘因此得以比较顺利地通行各国，从而比较具体地记载各地的地理状况。玄奘回国以后，唐太宗出于“扬威四海”的强烈愿望，迫切希望玄奘迅

速写出此书。这是《大唐西域记》的内容较诸以前各种地理书更为详细,更为真实的重要原因之一。《大唐西域记》所记述的国家达一百三十八个以上,分布的范围则以中亚、南亚为主,兼及西亚、小亚;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他亲履之地,大多数地理、交通描绘都真实可信,所载佛教古迹也多凿凿有据,不少记载已为现代考古发掘所证实。所以,即使仅就古代地理学而言,《大唐西域记》也完全称得上是一部杰出的著作。

《大唐西域记》的另一个重大贡献在于历史方面,即是在印度历史、印度佛教史及中西交通史方面的巨大史料价值。古代印度人在哲学、自然科学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,但是缺乏历史观念,没有给后人留下哪怕仅仅一部的翔实史籍。马克思也曾慨叹:“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,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。”(见其《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》)因此,玄奘的这一著作,被研究印度历史的学者们公认为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。印度史学家辛哈、班纳吉说:“中国的旅行家如法显、玄奘,给我们留下了有关印度的宝贵记载。不利用中国的历史资料,要编一部完整的佛教史是不可能的。”(见他们合著的《印度通史》)英国的著名印度史学家史密斯也曾说:“对于玄奘对印度历史的贡献,无论怎样评价也不会过高。”(见 V.A.Smith, *The Oxford History of India*)《大唐西域记》对于印度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都有所记述,例如关于伟大的语法学家波你尼,关于毗卢择迦王讨伐诸释,关于阿育王与太子拘浪拿的故事等;至于对贵霜王朝雄主迦腻色迦、公元 7 世纪上半叶北印度统治者戒日王等人的描述则更为详细。关于佛教史,《大唐西域记》保留的资料还要多。佛

教史上几次著名的集结,除了南传佛教承认的阿育王集结外,其它的活动也都被记载下来;大乘佛教的许多大师,如马鸣、龙猛(龙树)、提婆、无著、世亲等人的活动情况,书中也有不少描述。另一方面,《大唐西域记》还谈到了释迦牟尼的生卒年份,而这对于印度历史年代的确定,起着关键性的作用(当然,尚有其它汉文史籍也谈及了这个问题);释迦的生卒年份确定后,此前和此后的重要事件的年代才有可靠的依据,才能真正谈到历史。有的史学家形象地说,在古代印度没有年代的一片黑暗中,有一根闪光的柱子,这就是释迦牟尼的生卒年代。

《大唐西域记》不仅解决了其它史籍所没有解决的问题(例如关于印度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,关于重大历史事件,关于宗教力量的对比,关于佛教的结集,关于小乘部派的分布情况等),还提出了不少值得研究、解决的新问题。季羨林在《大唐西域记校注》的《前言》中指出,玄奘提及的各国的语言情况,至今尚未完全获得证实,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研究。提婆达多是释迦牟尼的死敌,他与释迦在当年的斗争,对于后世大乘佛教的教义和发展有否关系?这又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。此外,玄奘所记印度的若干社会制度、风俗习惯也有待于继续深入地搞清楚。

以上只是简要地提及了《大唐西域记》的主要价值,而实际贡献远远不止这些。它不但拓宽了当时中国人的眼界,以及为后世保存了珍贵的史料,并且还对中国日后的文化艺术施加了巨大的影响。由《大唐西域记》敷衍而成的著名古典小说《西游记》,便是生动的一例。真正能够流芳百世、永垂千古的作品,取决于它的内在价值,而不是依靠人为的吹嘘。

四、译注说明

最后,为方便读者阅读,再对本书的结构和体例等问题略作介绍和说明。

本书的原文以章巽校点的《大唐西域记》(上海人民出版社,1977年)为底本,基本抄录,只是将相应的繁体字改作简体。对于因古籍版本不同以及笔误或印刷错误而产生差异的个别字,则主要参考比对季羨林等撰写的《大唐西域记校注》(中华书局,1985年),推敲后做出修正。对于这些改动(也包括与底本有所出入的少量标点),不再逐一作注说明,以免文字过于琐碎。

全书对原文的三个《序》、十二卷正文,以及书末的《跋》和《赞》,均以原文、注释和译文三种形式予以介绍。由于内容较为丰富,故每卷(包括《序》和《赞》)都按地区或内容分割成数节,用阿拉伯数字标志序号。每节开首设置“题解”,以概括本节主要内容或其特色。每节又复分成若干更小的段落(在正文中,通常以单独一国或一城为限),以小数点后的数字为序,如1.1、1.2等。

对于全书注释中直接引用原句或重要观点的近现代著述,通常都用略称标志,其全称及相关信息则列于书末的略称表内,以供读者进一步查考。对于大量引用的古代史籍以及作为综合性和全面参考的近现代著述,除个别外,不再一一列出,以免过于冗长。

本书最初撰写于20世纪90年代初。当时,始终得到恩师章巽教授的直接指导,并且在参考资料方面获得大力支持;同时,